

doi. 10. 3724/1005-0566. 20260608

青年人乡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基于浙江三种典型模式的研究

胡伟斌, 梁江源, 何雨珂, 林 雯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 青年作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其入乡发展对破解乡村人才困境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运用“嵌入性—主体性”分析框架探讨了青年入乡推动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认为嵌入性构建有效助力青年融入乡村, 主体性构建有效助力青年赋能乡村。其次, 结合浙江省义乌市、安吉县和杭州市余杭区的生动实践, 对青年入乡发展的三种典型模式进行了深刻解析。研究发现, 义乌市的青年委员模式, 入乡青年具有高制度嵌入性与高社会主体性, 通过体制化路径参与基层治理,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 安吉县的青年创业模式, 入乡青年具有高关系嵌入性与高实践主体性, 依托市场化机制挖掘乡村资源发展产业, 实现个人与乡村共赢; 余杭区的青年运营模式, 入乡青年具有高资源嵌入性与高价值主体性, 以职业化运营盘活集体资产, 促进强村富民。三种模式均通过嵌入性与主体性的协同, 实现“内生与外生结合”“自利与公利平衡”,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浙江省的经验表明, 需以“千万工程”夯实基础, 以“引育用留”补齐短板, 以“双向奔赴”促进融合, 以“能级提升”增强吸引力, 为青年入乡提供政策支持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青年入乡; 乡村振兴; 人才振兴;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F323; C912. 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0566(2026)06 - 0097 - 16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mechanisms of youth engagement in rural development for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 study based on three typical models in Zhejiang province

HU Weibin, LIANG Jiangyuan, HE Yuke, LIN Wen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As a vital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youth engagement in rural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dressing the shortage of rural talent. This paper first employs an “embeddedness-agency”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youth participation in rural areas promotes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embeddedness effectively helps young people integrate into rural communities, 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agency enables them to empower rural development. Second, drawing on the vivid practices of Yiwu City, Anji County, and Yuhang District of Hangzhou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ree typical models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及其对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22BGL304);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项目“‘千万工程’引领乡村全面振兴·文化建设篇”(25WH01-5Z)。

作者简介: 胡伟斌(1980—), 男, 浙江衢州人,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农村产权与乡村治理等。通信作者: 林雯。

of youth engagement in rur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youth committee model of Yiwu City, young people entering rural areas demonstrate high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and strong social agency, participating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channels and fostering new industries and new business forms. In the youth entrepreneurship model of Anji County, young people exhibit high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strong practical agency, relying on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s to tap rural resources, develop industries, and achieve mutual benefits for both individuals and villages. In the youth operation model of Yuhang District, young people demonstrate high resource embeddedness and strong value-oriented agency, revitalizing collective assets through professionalized operation and promoting stronger villages and wealthier residents. All three models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forces”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self-interest and public interest” through the synergy between embeddedness and agency, thereby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e Zhejiang experience show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through the Green Rural Revival Program, address weaknesses through the attraction, cultivation, utilization, and retention of talent, promote integration through two-way engagement, and enhance attractiveness through capacity upgrading, so as to provide policy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youth engagement in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youth engagement in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talent re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青年是最富有活力、创造力与开拓精神的群体,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生力军。加快推动青年入乡,不仅能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更是破解人才瓶颈、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能的关键举措。20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提出“大力培养乡村人才,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全面振兴”,强调要“鼓励和引导青年入乡发展和就业创业,加强农业农村科技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培养”。同年次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也进一步提出要完善乡村人才培养和发展机制,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鼓励和引导城市人才服务乡村。这些政策导向表明,推动青年入乡发展已成为现阶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工作。

浙江省作为“千万工程”的源起地和实践地,实施 20 多年来,乡村的人居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都得到极大改善,吸引了大量人才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尤其在推进建设美丽乡村和发展美丽经济的过程中,积极推动青年入乡发展,促进乡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2019 年,浙江启动实施“两进两回”行动,即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行动,加快推动了科技、资金、人才等城市优质资源要素流向乡村,进一步激发了乡

村发展活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5 年,浙江省委一号文件《关于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实施意见》,提出“强化青年入乡‘引育用留’全链条政策供给,建设乡村人才振兴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融合发展集聚区”“支持建设青年人才社区,为青年入乡提供良好工作生活环境”。根据该文件,各市县也竞相出台了吸引青年入乡的政策举措,形成设计政策招引人才、健全机制培育人才、搭建平台用好人才、提升服务留住人才的新局面。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网站,“十四五”以来,浙江累计培育农创客超 10 万名、现代“新农人”58.4 万人,带动 60 余个乡村亿元产业崛起和超百万农户增收。浙江青年入乡发展的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根据浙江青年入乡发展的生动实践提炼出三种典型模式,并选择相应的三个典型县(市、区)作为研究案例,深入分析与比较,揭示其在推动青年入乡助力乡村振兴上的作用机理和经验启示,既丰富了青年入乡发展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研究,也为全国其他地区推动青年入乡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文献回顾

关于青年入乡发展问题,学界展开了诸多讨论,根据其研究内容可概括为以下 4 个方面。

第一,对青年的范围界定与类型划分。对于青年的范围界定存在分歧^[1],本文采用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4月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所规定的青年年龄范围为14~35周岁。在青年入乡发展的研究中将青年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划分,并总结出不同类型青年的发展特点。例如,按照青年与乡村社会的强弱关系可将乡村青年划分为三类:已经市民化的进城青年、未市民化的打工青年、长期生活在乡村的在乡青年^[2]。从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取向和作用差异角度将青年分为知识型、返乡型和在地型,知识型青年注重政治性价值追求,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返乡型青年追求地方性和国家性创业支持,带动农村就业;在地型青年在维系村庄社会秩序中起到“中坚”作用^[3]。还有研究将入乡青年简单划分为本土青年和返乡青年两类,本土青年在乡村社会中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具有农业生产与服务的现实基础,返乡青年具有较好的信息资源、文化资源、资本资源和政策敏感性,可以提供多样化公共服务,也具有任务性、短期性、唯经济性等特点^[4]。

第二,青年为何入乡。青年在城乡间的流动是双向的,早期为单向度的“乡—城”流动,最近十多年来出现逆向回流,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之一^[2]。许多研究就青年人返乡的动力机制展开分析。一部分研究侧重分析外在客观条件,认为创业就业的政策支持、乡村的基础设施、教育培训体系等是影响青年返乡决策的核心因素^[5-6]。土地规模化经营空间的供给与基层政府创业支持环境的质量,构成了青年回乡创业的客观基础^[7]。还有研究侧重于青年的意愿、体验、认知等主观条件^[8],并且从主体性构建视角分析青年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内生动力机制^[9]。青年返乡既是市场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充满了文化乡愁的朴实情感和社会责任维度的担当与理想抱负^[10-11]。近期的研究则综合考虑内外部阻力,从城市端、农村端、个人端等多重维度考察返乡青年的形成机制^[12]。青年农民返乡创业的主观原因包括打工所形塑的主体性构建和劳动观念转型,客观社会条件包括

人口红利转向、城市消费转型与乡村建设累积效应等^[13]。

第三,青年下乡何为。青年入乡的主要实践类型包括三种:作为创业青年开展创新创业^[13],作为青年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14],作为乡村职业经理人负责乡村产业管理和经营服务^[15]。大量研究聚焦于返乡青年的创业行动^[6,16-19]。毛一敬^[7]将青年返乡创业实践分为家庭本位下的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和自我实现驱动的兴趣导向型返乡创业。青年农民返乡创业路径主要包括联合多个农户的集合型创业,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化创业^[13]。梁伟等^[20]通过分析返乡创业大学生作为青年职业农民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案例,认为青年职业农民的发展实践是重新嵌入村庄社会的过程,其通过主体嵌入、关系嵌入和政治嵌入机制实现了个人发展。但是,返乡青年创业也面临着不少现实问题^[21],如转移产业与乡村结构性矛盾以及青年自身能动性有限的困境^[22],还有创业领域“脱嵌”于产业振兴需要、人员“脱嵌”于乡土传统社会、资源“脱嵌”于企业现实需要等问题^[23]。与返乡青年创业逻辑不同,返乡青年治村是基层制度变迁和治理转型背景下的一种基层组织建设创新实践,其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具有显著的社会和政治动机,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助于推动村级组织的行政化,但青年村干部为民服务动力不足、偏离群众路线,在村庄矛盾纠纷等内部事务化解上短板凸显^[14]。乡村职业经理人是近年来在乡村振兴中出现的新兴职业群体,其受雇于村集体所有或控股的集体公司,具有一定市场运营能力或企业家才能,主要负责经营管理集体资源资产,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24]。目前关于乡村职业经理人的研究较少,主要围绕设立逻辑^[25-26]、作用机制^[27]和自主性困境^[28]展开分析。郭世平等^[29]从主导层、任务层、动力层和标准层四方面归纳出青年乡村职业经理人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并指出当前面临的运营公司整合范围有限、政企权责边界有待清晰、职业长期规划尚未明确的现实困境。

第四,青年何以助力乡村振兴。大多数研究

围绕单一类型,如青年创业,分析其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及现实困境等^[7,23]。有限的相关文献初步搭建了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分析框架,这些研究主要以嵌入性和公共性作为理论依据,认为嵌入性影响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叠加影响青年助推乡村振兴的绩效^[30]。然而,尽管这些研究涉及发挥青年主体性作用的讨论,但并未将其纳入分析框架,忽视了青年主体性作为关键因素对治理意愿的影响,缺乏对青年主体性与乡村实践之间动态、互塑的关注^[31]。此外,也有研究基于“本土—返乡”框架选取青年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围绕参与主题、领域、逻辑、动机等方面对本土青年和返乡青年的特征进行归纳,试图为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扶持政策^[4]。但是此类研究主要针对青年个人的案例进行分析,缺乏对区域性发展模式的整体观察、分析与总结,对于制定切实可行的区域性政策参考作用较为有限。

已有研究围绕青年入乡发展的主体类型、动力机制、实践形态和作用效果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讨论,为理解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空间。第一,现有研究较多关注青年为何返乡、如何创业、如何参与治理等具体问题,对青年入乡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和理论逻辑阐释仍相对不足,特别是缺乏能够同时解释青年“如何融入乡村”与“如何赋能乡村”的综合分析框架。第二,部分研究已经使用嵌入性、公共性等概念分析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但对青年主体性的理论地位重视不够,未能充分揭示青年在乡村实践中的自主性、能动性、价值追求及其与乡村组织、关系和资源之间的动态互构关系。第三,已有文献多从创业青年、青年村干部或乡村职业经理人等单一群体和个人案例展开分析,较少在统一理论框架下比较不同类型青年入乡发展的差异化路径,也较少从区域实践层面对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进行归纳总结。

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嵌入性—主体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究引导青年嵌入乡村社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和深层逻辑,并结合浙

江省义乌市、杭州市余杭区和湖州市安吉县的青年入乡实践案例,解析每种模式的产生基础、运行机制、作用成效以及适用条件等,并据此提出经验启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理论框架上,本文将嵌入性与主体性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分别从制度嵌入性、资源嵌入性、关系嵌入性以及实践主体性、价值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六个维度,解释青年入乡发展中“融入乡村”与“赋能乡村”的双重过程,从而拓展了青年助推乡村振兴研究的理论解释视角。二是在机制分析上,本文进一步揭示嵌入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协同关系,强调青年入乡推动乡村振兴并非单纯依赖外部政策输入或青年个人行动,而是在内生与外生结合、自利与公利平衡的过程中实现持续发展。三是在模式归纳上,本文结合义乌市、余杭区和安吉县的实践案例,总结出青年委员体制化发展模式、青年创业市场化发展模式以及青年运营职业化发展模式,丰富了青年入乡发展的类型化研究。四是在实践启示上,本文不仅关注青年个体如何参与乡村振兴,也关注地方政府、村级组织和市场社会力量如何协同构建青年入乡发展的支持体系,由此为完善青年人才入乡机制、优化乡村振兴人才政策和推广浙江实践经验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参考。

二、嵌入性与主体性:青年入乡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入乡青年的嵌入性与主体性

“嵌入”的字面意义是指某个事物被植入或根植于另一个事物之中的状态,表达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紧密程度。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最早由 Polanyi^[32]提出,旨在探讨经济活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在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Granovetter^[33]将 Polanyi 的宏观制度分析进一步微观化,基于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将这一概念进行拓展和细化,强调经济行为并非完全由市场机制或理性选择驱动,而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体的行为受到其社会关系的约束和影响。Zukin 等^[34]对 Granovetter 的嵌入性概念进行了扩展,提出嵌入性

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问题,还涉及文化、政治与制度环境。他们主张嵌入性具有多重维度,并将嵌入性分为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4种。随着嵌入理论的发展,其应用不再局限于解释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间的嵌入性关系,而拓展至研究人类所有行为嵌入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多个学科领域的重要理论分析工具。例如,学者们利用嵌入性理论分析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过程^[35]、探索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36]或构建国家数字能力建设评价框架^[37]。在乡村振兴方面,有学者使用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时间性嵌入对不同类型青年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30]。“嵌入性”理论同样适用于探究青年如何助推乡村社会发展。实践中,受到相关政策制度引导,入乡青年群体凭借自身资源累积优势,以资源再生产的方式逐步融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并将行动从经济领域向公共事务领域延伸拓展,以多元化的行动方式推动乡村振兴^[39]。因此,本文参考以往文献将入乡青年的嵌入性划分为三个维度:制度嵌入性、资源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

对主体性的探讨主要源自哲学。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关系范畴,主体性表现为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主性、主动性、能动性乃至创造性的特征。在社会学领域,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主体性理论同样强调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该理论揭示了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复杂双向动态关系:社会结构制约个体行为,个体行为也能创造和改变这些结构。在现代就业与创业市场上,青年人对自身职业发展的主动规划充分体现出对个体行为与环境的关系的审视以及对社会条件变化的适应^[39],并更倾向于追随内心的声音,拒绝从事他们认为无意义的工作任务^[40]。在关于返乡青年的研究中,不少学者也认为主体性构建是青年返乡的重要原因^[9,13],并强调了返乡青年充分发挥主体性对乡村发展的重要作用^[31]。根据马克思实践的主体性理论,主体性与实践性相互依存,人的主体性在实践活动中得到确认,但实践活动也离不

开作为人的主体性^[41]。青年入乡发展本质是实践的过程,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青年的主体性得到确认,同时乡村发展成效也离不开青年的主体性。因此,参考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三个维度,将入乡青年的主体性划分为实践主体性、价值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42]。在青年入乡发展研究领域,实践主体性反映青年参与乡村建设的主动性,价值主体性反映青年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价值的自由性,社会主体性反映青年在个人发展的同时引领村庄及村庄共同体发展的自主性。

(二)理论逻辑:青年的嵌入性、主体性与乡村振兴

入乡青年的嵌入性包括制度嵌入性、资源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三个维度,分别体现了与村级权力结构的关联、与乡村资源的互动,以及与村民群体的情感联系。第一,制度嵌入性。入乡青年的制度嵌入性指与村两委的关联状况。入乡青年成为村两委组织成员,或者与村两委组织及村干部具有较好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表示入乡青年具有很高的制度嵌入性。制度嵌入性越高,制度的外生推动作用越强,青年越能够依托地方政策支持,运用或改变村庄治理制度,实现乡村治理体系革新和发展。第二,资源嵌入性。入乡青年的发展资源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指青年所积累的生产、技术、市场、资金、人脉等自身具备或掌握的内生资源,另一方面指乡村为青年提供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优惠政策、丰富劳动力等各类外生资源。青年入乡发展将自身掌握的内生资源与乡村能够提供的外生资源进行有效协同、融合和利用,则表示入乡青年具有高资源嵌入性。资源嵌入性越高,青年入乡后通过有效整合自身资源嵌入乡村社会,发掘乡村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三,关系嵌入性。入乡青年的关系嵌入性主要指青年与村庄原住居民的互动交往和情感联系。与村民的互动越频繁,交往越紧密,说明关系嵌入性越强。青年入乡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外来青年进入乡村,二是本地青年回归乡村。后者与乡村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天然的关系联结,相较于前者在关系嵌入性层面具备先天优势^[43]。关系嵌

人性赋予青年发展的内生力量,关系嵌入性越强的入乡青年不仅能够获得村民信任,还因具备村庄文化认同和情感链接,得到村民的认同和较高的声望,因而能够有效地引领和动员村民、组织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动员村庄资源、获得村民的认同和支持。综上,青年的嵌入性越高,在引领和动员村民参与、组织村民、获取村民认可、利用资源、获得政策支持等方面越具有优势。因此,青年的嵌入性从内生和外生两方面影响其发展能力,表现为嵌入性越高则发展能力越强,嵌入性越低则发展能力越弱。

入乡青年的主体性指的是青年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包含实践主体性、价值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三个维度,分别在参与乡村建设、实现个人价值和引领乡村发展方面体现。第一,实践主体性。入乡青年的实践主体性体现在青年主动进入乡村,在乡村开展就业和创业等实践活动。青年积极参与乡村经济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并且展现出较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显示出其具有较高的实践主体性。实践主体性越高,表明青年入乡发展的热情越高,干事创业的决心越坚定,能够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盘活乡村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第二,价值主体性。入乡青年的价值主体性指青年在乡村场域的实践活动中获得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价值。该维度强调了青年入乡发展的目的。青年一方面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应有的报酬,得到满足自身生存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远离城市喧嚣,置身乡村优美的自然环境,实现创业梦想,感受家乡的亲情与温暖,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个人精神追求。当青年投身于乡村发展能够充分实现个人价值,则认为具有较高价值主体性。第三,社会主体性。入乡青年的社会主体性指青年在个人发展的同时带动乡村及周边居民共同发展的引领性。该维度将青年个人的主体性拓展至乡村社会层面,有学者也把这一本质归纳为青年的公共性^[30]。作为治理主体的青年将自我实现与乡村发展目标愿景相统一,进行公共利益表达、公共事务参与和公共精神传递,则认为其具有高社会主体性。社会主体性越高,表明青

年愿意借助体制化机制、市场化机制、社会化机制等嵌入乡村社会^[30],将个人发展融入乡村振兴的使命愿景中,引领乡村发展。青年的主体性体现出青年在乡村发展中的三重角色:参与者、受益者和引领者。这三重角色包含了“自利”与“公利”双重目标。入乡青年主体性越高,越能主动且充分发挥个人能力开展就业创业实践,实现个人价值追求,完成“自利”目标,并将个人发展目标融入乡村振兴使命愿景,完成“公利”目标。因此,青年的主体性影响其实现“自利”与“公利”的双重发展目标,主体性越高则越接近双重目标的实现,双重目标的实现将极大地激发青年推动乡村振兴的意愿。

青年入乡推动乡村振兴的成效同时取决于嵌入性和主体性的构建。嵌入性构建有效助力青年融入乡村,主体性构建有效助力青年赋能乡村。嵌入性与主体性构建的目的是实现内生与外生结合、自利与公利平衡。青年推动乡村振兴既需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例如获得村民信任、提升村民素质和合作意识,也需要利用外生制度与资源,例如政府政策支持、社会资本投入等,同时需要在个人发展(自利)和乡村集体利益(公利)之间找到平衡点。仅仅具备将内生与外生有机融合的能力但在利己与利他方面失衡,则会制约能力发挥;仅仅平衡自利与公利,但缺乏协调内生与外生资源、制度与关系,会造成无效努力。只有实现内生与外生结合、自利与公利平衡,才能有效参与和推动乡村振兴。

同时,入乡青年的嵌入性与主体性并非相互独立的两个维度,而是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呈现出相互塑造、动态协同的关系。一方面,较高的嵌入性能够为青年发挥主体性提供制度支持、资源基础和社会信任,使青年在乡村发展中获得行动空间和实践条件;另一方面,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也有助于青年不断拓展嵌入深度,通过积极参与治理、整合资源、服务村民和引领发展,进一步增强其在乡村社会中的认同度与影响力。因此,青年在嵌入乡村的过程中发挥主体性,又在主体性实践中深化其制度、资源和关系嵌入,形成良性循环。具

体地,制度嵌入性与社会主体性相协同,推动青年从“外部参与者”转向“治理共同体成员”;关系嵌入性与实践主体性相协同,推动青年从“个体行动者”转向“乡村实践组织者”;资源嵌入性与价值主体性相协同,推动青年从“资源使用者”转向“价值创造者”。在这一过程中,嵌入性为主体性发挥提

供结构条件,主体性为嵌入性深化注入行动动力。只有当青年既能够有效融入乡村制度、资源和关系网络,又能够在乡村发展中充分发挥实践、价值和社会主体性时,青年入乡才能真正实现从进入乡村到扎根乡村、从个人发展到共同振兴的转化(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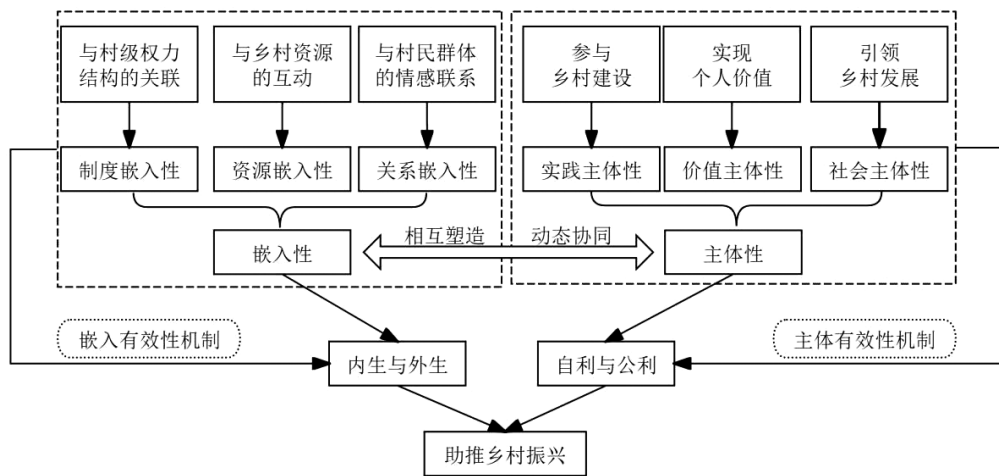


图1 青年嵌入性、主体性与乡村振兴分析框架

三、浙江青年入乡发展的典型实践

从青年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逻辑来看,青年入乡发展可依据其嵌入乡村的机制差异与主体性发挥方式的不同,划分为青年委员模式、青年创业模式和青年运营模式三种理想类型。本文以浙江省义乌市、安吉县和余杭区为典型案例,对以上三种模式的生成情境、运行机制与治理绩效进行比较分析。这三种模式分别代表了体制化、市场化与职业化三种不同的青年入乡发展路径,在人才类型需求、主导力量配置与乡村振兴着力点上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一)青年委员模式(或青年治理模式)

青年委员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一种体制化入乡路径,其核心特征在于通过制度嵌入实现青年人才与乡村权力结构的有机融合,也可称之为青年治理模式。在该模式中,青年以制度化身份进入村级治理体系,凭借高制度嵌入性获得乡村事务的参与权与决策权,并通过高社会主体性将个人发展融入村庄公共利益的实现过程。政府作为主导力量,通过制度供给与政策激励构建青年入乡的体制化通道,使青年委员成为连接外部治理

资源与村庄内生发展需求的关键节点。

该模式以浙江省义乌市为典型代表,主要是为了破解乡村治理体系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2019年,义乌全市4172名村社干部中超50周岁的占比近一半,35周岁以下的仅占6%,村干部队伍的代际断层直接制约着基层治理的回应能力与集体经济的创新发展。随着农村人口持续外流,村级组织普遍面临治理能力弱化与年轻后备干部匮乏的双重压力,且难以顺应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发展需求。2019年6月,义乌市利用村社换届契机,创新实施“一村一青年委员”制度,要求每个村社至少有一名35周岁以下青年进入“两委”班子。此次换届后,全市537个村(社区)产生的685名青年委员,平均年龄29.3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87.6%,在村社“两委”干部总数中占比22%,全市“两委”班子平均年龄较上届降低4.8岁。正是通过外部制度供给的方式,以体制化身份将青年人才嵌入乡村治理结构。这一制度创新通过设定明确的年龄准入门槛与规范化选拔程序,将具备现代治理理念的青年人才纳入村级权力体系,使其成为村庄的体制内精英,获得正式的治理身份与

制度化的行动空间,进而实现青年个体能力与乡村治理需求在体制层面的有效对接与有机耦合。

青年委员模式的运行机制体现为政府通过选拔、培育、激励“三位一体”的制度化支撑体系。在选拔环节,义乌市面向全国公开遴选农村青年后备干部,通过标准化筛选流程层层甄别合格人选;同时建立系统化的任期目标管理机制,依托月度工作通报、季度履职评议、年度述职考核等闭环管理手段,保障任期目标的落地执行。在培育环节,以“青马工程”团校学习、“流动履职”排班计划与治村导师帮扶三管齐下开展培育,定期组织青年委员参与团市委机关、行政服务中心等岗位轮训,通过理论赋能与实践历练的协同作用,推动青年委员的治理能力快速提升。在激励维度,构建了经济激励与政治激励并重的制度组合。经济上为专职、兼职青年委员分别提供 6.45 万元和 3.05 万元的年薪保障,配套子女入学、人才绿卡、购房补助等福利政策;政治层面则开放入党“双通道”机制,并每年拿出 10 个基层岗位(涵盖国企、社区工作者、事业单位、公务员岗位)定向招考表现突出的青年干部,为青年的发展打开了上升通道。这种“三位一体”的闭环机制,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效回应了青年入乡面临的收益不确定性与职业前景模糊性这两大核心障碍。

在治理绩效层面,青年委员模式呈现出从乡村治理到兴业富民的递进逻辑。青年委员凭借制度赋予的决策参与权,以党建引领统筹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并带动农民增收。例如,义乌市大陈镇自 2019 年起整合全镇 32 个村青年委员力量,携手“大陈小集”运营团队打造“大陈小集共富工坊”,以党建为引领统筹各村农业与旅游资源,通过“一村一品”差异化策略为各村定制共富路径。上坑仁村的青年委员叶晓岚上任以后,围绕村庄发展,带领村民改造蓄水坝,因地制宜利用当地水资源带领村民建设水上乐园,当年就为村集体增收 57 万元;此后进一步打造“水韵上坑仁嬉水平台”、推出“水上星光夜市”等项目,截至 2024 年累计接待游客超 3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逾 300 万元,带动周边 8 个村庄约 2 000 名农民参与文旅产业。

可见,青年委员模式的核心实践逻辑在于:青年委员通过高制度嵌入性获取治理合法性,再通过高社会主体性将治理效能外溢至经济发展领域,形成以治理促进发展、以发展强化治理的正向循环。然而,该模式亦面临结构性张力,即青年委员作为通过体制化路径进入的外部力量,可能遭遇村庄原有治理精英的排斥与村民的初始信任壁垒,因此构建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与信息沟通渠道,成为保障治理效能持续释放的核心前提。

(二) 青年创业模式

青年创业模式是一种市场主导下的青年入乡路径,其核心特征在于青年通过市场化的资源开发与合作机制嵌入乡村社会。与青年委员模式的制度化嵌入不同,该模式中的青年主要是凭借自身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在乡村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之间建立联结,以创业实践实现与乡村社会的嵌入、互动与融合。在这一模式中,政府主要扮演服务者与赋能者的角色,通过政策供给降低创业门槛与经营风险,而市场机制则成为人才集聚、资源配置、项目发展和收益分配的主导力量。

该模式以浙江省安吉县为典型代表,其生成逻辑根植于乡村资源禀赋与青年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匹配结构。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安吉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吸引青年入乡创业的核心比较优势,创新推出“大自然工位”概念,为入乡青年打造“推窗见绿”的生态化灵活办公场景。例如,2023 年安吉余村联合周边村对 3.7 万 m^2 的闲置土地与建筑资源进行整体开发,打造青年创业空间“青来集”,运营仅一年多时间即集聚 60 余个新经济项目,吸引 1 200 余名青年入驻办公。在平台建设上,余村推出“全球合伙人”计划,面向全社会招募有志于乡村发展的青年合伙人,为其提供项目落地、资源对接与社群支持;建设 DNA 数字游民公社,为远程办公的数字游民群体提供共享办公与生活空间。在社群营造上,配套共享食堂、青春社团等社交工程,常态化举办“青春社团”“缘定安吉”等活动,增强入乡青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以资源吸附为核心、以环境优化为支撑、以平台搭建为载体、以社群营

造为纽带的引才机制,增强了乡村场域的宜居宜业,为青年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土壤与空间。

青年创业模式的运行有赖于政府制度供给与市场主体行为的协同演化。在资金支持维度,安吉县出台《优化支持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安吉县青年入乡发展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为创业人员提供每月1200元至4500元不等的生活补贴,按青创项目等级分别给予3万元至22万元创业补贴奖励;推出创业无息贷款政策,设立各1亿元的“创业梦想基金”和“青年入乡创业贷”,2022年以来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64亿元。在空间供给维度,依托村内闲置资源资产系统构建“百人村、千人园、万人城”梯度青年创业空间,为不同发展阶段创业者提供差异化物理空间;创新推出“人才共有产权住房”政策,按学历给予来安创业人员10万元至50万元不等的房票补贴,目前已累计推出共有产权房近4500套,724名青年人才享受政策红利。在人才选拔维度,安吉县自2023年起连续举办“两山杯”创新创业大赛,聚焦乡村创业业态创新、农文旅品牌打造等核心领域,遴选具备高学历背景与专业技能的优质创业人才。这一系列政策设计并非对市场机制的替代,而是通过弥补市场失灵、降低创业风险和成本,为青年发挥其高实践主体性创造制度条件。青年创业者以自主决策方式发现市场机会、配置资源要素并承担经营风险,其创业实践既是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乡村资源价值再发现与产业链重构的过程。

在治理绩效层面,青年创业模式展现出从利益联结到治理辐射的扩散效应。青年创业者将自身资源带入乡村,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乡村沉睡资源,并体现出较强的联农带农作用。以安吉红庙村“深蓝计划”为例,青年创业者程铄钦带领平均年龄25岁的大学生运营团队,将村内的废弃矿坑改造为乡村咖啡馆,并通过“两入股三收益”利益机制,让村集体以资源资产入股、农民以土地经营权或闲置资源入股,形成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利益联结。青年创业团队占股51%,负责所有运营;村级强村公司占股20%;村民代表集合村民资金,占股29%。至2025年6

月,“深蓝计划”累计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实现2000多万元营收,为红庙村带来150万元的分红,300余万元的租金和薪金收入。与青年委员直接获取治理决策权不同,创业青年并非一开始直接介入乡村治理,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呈现出间接性与渐进性的双重特征。随着利益联结深化以及在地社会网络的逐渐嵌入,创业青年的市场化运营理念逐步渗透至乡村治理实践场域,既丰富了乡村的治理资源,也影响和带动村级治理主体的理念和能力。然而,该模式也面临创业者市场经验匮乏、乡土适应周期较长等约束,需完善创业培训体系与乡土社会融入机制。

(三) 青年运营模式

青年运营模式即乡村CEO模式,是一种职业化入乡路径,其核心特征在于通过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委托—代理结构,将专业化的经营管理能力引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该模式中,政府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引入具备现代经营理念与市场运作能力的青年人才,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受聘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盘活集体资源资产、优化产业布局与提升运营效率。2025年7月,乡村CEO以“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名称正式被纳入国家新职业。青年职业经理人凭借其高资源嵌入性整合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资源,并通过高价值主体性在实现个人职业发展的同时带动集体增收与村民致富。

该模式以杭州市余杭区为典型案例,核心逻辑是通过职业化、专业化的经营能力进入乡村场域,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运营支撑。2019年7月,余杭区农业农村局面向全国公开遴选首批农村职业经理人,对聘用人员实行市场化管理。以余杭区永安村为例,该村地处基本农田保护区,97%的土地属于永久基本农田,长期被视为“没资金、没用地、没风景”的落后村,集体资产运作陷入两种低效路径:一是以固定租金外包给本地大户,村集体仅能获取有限租金收益;二是引入外部企业开发,但大部分增值收益被外部资本攫取。与此同时,村集体自身面临行政治理任务繁重与市场化经营能力不足的双重约束。这

种资源禀赋与运营能力错配的发展困境,本质上是传统集体产权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合一,进而导致的专业化运营分工缺位。青年运营模式正是通过委托—代理机制实现经营管理权与村级治理权的适度分离,引入具备市场化专业能力的职业经理人,最终实现集体资产的专业化运营与市场化价值增值。

青年运营模式的运行机制体现为政府主导下的职业化治理机制。与青年委员模式侧重于治理权力的制度化分配不同,青年运营模式的核心指向是村级经营能力的专业化配置。在准入机制上,余杭区通过资格审核与公开选拔程序从全国遴选青年人才,建立规范化的职业准入门槛;在培养机制上,推进职业经理人集中培训、农创客创业游学班、农业领军人才学历提升等 18 项重点项目,为其提供成长平台。在考核机制上,以季度汇报与年度岗位考核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形成委托方(村集体与政府)与代理方(村 CEO)之间的合约治理结构,将年度运营目标完成度作为职业经理人续聘与否的核心决策依据;在激励机制上,基本年薪为每年 18 万元,由区级财政统筹保障,而绩效薪酬则由各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运营业绩制定差异化考核方案。如此,将个人收益与集体经济发展绩效挂钩,形成激励相容的利益联结机制。

在治理绩效层面,青年运营模式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力的加持,加快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资产,推动集体产业转型升级,同时通过培育多元业态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发展中来,从而有效地推动强村富民。截至 2025 年底,全区农村职业经理人累计带动落地项目 163 个,吸引投资 4.29 亿元,运营村的集体经营性收入增速高达 24.36%。全区 143 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12.89 亿元,村均 901.60 万元,经营性收入 250 万元以下的相对薄弱村已全面消除。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62 050 元,城乡收入持续缩小至 1.47:1。以永安村乡村 CEO 刘松为例,2020 年受聘后针对该村作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发展受限的困境,以专业化运营破局。他带领团队推动土地流转和农业数字化转型,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培育“稻+”多元产业链,涵盖农

产品加工、休闲康养、体育文娱、研学培训等业态,并联合周边 8 村共建“禹上稻乡”片区强村公司,共同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和差异化布局村庄业态,带动农民增收。2025 年永安村农民人均收入 6.6 万元,村集体经济从 2018 年的 56.85 万元增至 2025 年的 650 万元,获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浙江省和美乡村典型案例等荣誉。集体经济的壮大增强了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治理权威,也增进了村民对集体的信任和发展认同。然而,该模式也面临可持续性挑战:乡村 CEO 的治理绩效高度依赖其个人能力与外部资源网络,本土化的职业经理人培养体系尚未成熟;乡村 CEO 与村两委之间的权责边界在实践中仍可能存在模糊地带,需进一步明确委托—代理关系的运作规则。

综上所述,青年委员模式、青年创业模式与青年运营模式分别代表了体制化、市场化与职业化三种差异化的青年入乡路径。三种模式在嵌入机制、主导力量、权力来源与治理绩效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分野(见图 2),但又共同遵循着嵌入性与主体性协同驱动的核心逻辑,为理解青年入乡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提供了类型学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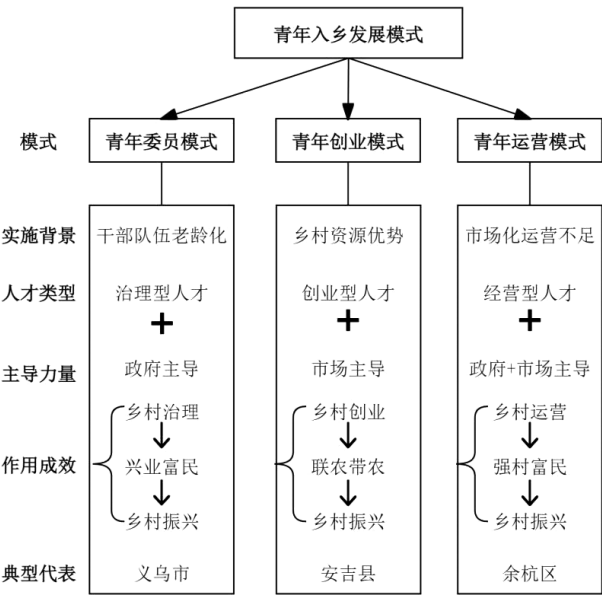


图 2 浙江青年入乡发展的三种典型模式

四、青年入乡发展的实践机制分析

上述三地的案例分别从体制化、市场化和职业化三种视角为青年提供了入乡发展的模式。从

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性机制来看,这三种模式既有相同点,但又各具鲜明的特点。三种模式的相同点在于其均融合了一定程度的制度、资源和关系嵌入性以及实践、价值和社会主体性,但每种模式又呈现出差异化的侧重点。下面,本文将结合前文的“嵌入性—主体性”分析框架对三种青年入乡发展模式进行详细剖析:

(一)“高制度嵌入性—高社会主体性”:青年委员的体制化发展

青年委员模式下的入乡青年具有较高的制度嵌入性与较高的社会主体性。高制度嵌入性表现在,青年在国家以及地方政策制度的引导下,主动利用政策制度进入乡村基层体制内,通过对地方政策制度的创新完善从而推动乡村振兴。义乌市推行“一村一青年委员”制度设定,政府通过公开条件招聘的形式选拔青年,并提供薪酬保障、学历教育和学费报销等福利补贴,激励更多青年投身乡村工作中,为农村基层治理组织的年轻化转型奠定基础,更为有志于乡村振兴梦想的青年搭建体制化平台。让青年通过制度性道路嵌入乡村生活,对传统乡村的生产、生态与生活空间进行现代化重筑,实现乡村资源的良性再生产^[44]。选聘出的青年委员普遍拥有较好的治理才能、较强的创新精神、强烈的乡村治理参与意愿等,使政府通过赋权,实现了乡村治理过程中参与权与决策权的再分配。

同时,青年委员模式中青年人才的另一发展特征是具有较高的社会主体性。马克思深刻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不仅体现为个体主体,更体现为社会成员共同组成的社会主体,体现为人民群众,社会主体性揭示了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43]。青年委员的高社会主体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青年委员具有很强的“公利性”,将乡村集体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带领村民致富是本职工作;另一方面,青年委员的工作依赖于村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需要团结村民,集中力量携手共富。

在义乌市的案例中,高制度嵌入性与高社会

主体性的青年,通过村庄权力制度的深度嵌入,实现了个人资源与乡村原有资源的深度融合与高效利用,不仅推动了乡村自身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共同富裕,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开创了乡村振兴新局面。具体而言,该模式通过“外生制度赋能+内生组织激活”的方式实现内生与外生相结合。首先,青年委员依托政府选聘、组织赋权、薪酬保障、政策培训等外生制度安排,获得进入乡村治理体系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其次,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联系村民需求、协调村庄资源、重塑治理秩序等方式,激活乡村内部的组织能力、村民参与意识和公共合作精神。由此,外生制度供给转化为乡村内部治理能力的提升,青年委员在制度支持与村庄内生动力之间发挥了连接和转化作用。同时,青年委员模式也通过“个人晋升发展+公共治理职责”的方式实现自利与公利平衡。青年委员进入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后,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身份、薪酬保障、能力锻炼和政治社会资本积累,这构成其个人发展的“自利”基础;但其岗位职责又直接指向村庄治理、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和共同富裕,要求其将个人能力发挥嵌入乡村公共利益实现之中。这表明,青年委员的个人成长并不是脱离乡村发展的单向收益,而是在服务村庄、动员村民和推动公共事务改善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因此,该模式下的自利与公利通过体制化岗位安排被制度性联结起来:青年越能推动村庄发展,越能获得组织认可、村民信任与个人成长空间;村庄越能为青年提供稳定的发展平台,青年越有动力持续投入乡村治理实践。

但是,这种模式所面临的问题在于青年委员在推动乡村变革的过程中,可能会与原村委班子及村民存在观念、利益分配等多重冲突,从而受到多方面阻碍进而影响工作顺利推进,亦对青年委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构成挑战,因此应建立完善的信息反馈制度与利益联结机制,以确保发展规划符合村民实际需求并保障各主体利益实现。因此,作为青年入乡发展的体制化道路,高制度嵌入性和高社会主体性既是青年委员模式的特征,又是保障青年委员发挥个人能力、有效助推乡村振兴的机制。

(二)“高关系嵌入性—高实践主体性”:青年创业的市场化发展

青年创业模式中,青年具有较高的关系嵌入性和实践主体性。高关系嵌入性体现在青年与乡村社会成员的情感维系以及由此结成的广泛、深入的关系网络。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返乡青年在乡村社会发展提供关键性社会支持^[39]。对于本乡青年,其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与乡村社会成员形成天然纽带,为其快速嵌入乡村、与村两委合作、利用村庄资源提供了先天优势。返乡青年的初衷往往是照顾好家庭,所以当有成熟的就业或创业渠道时,留在乡村成了很自然的选择。而对于异乡青年,因缺少与乡村的天然链接,所以后天人为增强其与乡村社会网络的连接十分重要。青年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可以从两方面得以拓展:一方面,青年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与村两委和村民进行沟通、协商与合作,例如产生雇佣合作等劳动关系或利润分红等利益联结,由此逐步丰富和拓展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乡村为了留住青年人才,搭建社交平台,增强人才的归属感,加深青年人才与乡村社会网络的关系。

此外,青年创业模式还体现出较高的实践主体性。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主体性集中表现为人的能动性,尤其是创造性和创新性^[43]。创业实践对青年的创造性与创新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主要由青年个人意愿驱动,因此青年创业模式具有更高的实践主体性。尽管青年创业模式同样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引领,但与另外两种模式不同的是,创业的自由度更加宽泛,但在获得创业自由的同时,也同样面临着自负盈亏的风险。这一市场化发展道路中,能否实现创业理想,更多取决于青年人才因地制宜、发掘创业机会、把握市场需求和创新经营的能力。

在安吉县的案例中,高关系嵌入性与高实践主体性的青年,经政府激励来到乡村开创事业,依托自身社会关系、物质资金等资源为农业农村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同时,这些青年架起了城乡经济融合的桥梁,将城市资源要素引入乡村,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促进更多经

济发展要素向农村汇聚,还为村庄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而且通过创业活动带动的土地流转、“废土”利用也为农民带来了额外的现金收入,从而为农业农村的共同富裕之路奠定坚实基础。具体而言,该模式主要通过“外生要素导入+内生关系转化”的方式实现内生与外生结合。青年创业者将资金、技术、品牌、市场信息、经营理念和城市消费需求等外生要素带入乡村,但这些外部资源只有嵌入乡村熟人社会、土地资源、劳动力结构和地方文化场景之中,才能真正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实际动能。关系嵌入性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它使青年创业者能够获得村民信任、协调土地流转、组织劳动力参与,将外部市场机会与村庄内部资源禀赋有效连接。由此,青年创业通过关系网络把外部市场资源转化为乡村内部产业活力。同时,青年创业模式也通过“个人创业致富+村庄集体共富”的方式实现自利与公利平衡。青年创业者首先具有明确的个人发展目标,需要通过创业活动获得经济收入、职业成长和自我实现,这是其持续留在乡村、投入乡村的重要动力来源。但如果创业活动仅停留在个人盈利层面,便容易与村民利益、村庄资源利用和乡村治理目标发生脱节。安吉县案例表明,青年创业者通过雇佣村民、带动土地流转、盘活闲置资源、吸引外部消费和促进产业集聚,将个人创业收益与村民增收、村庄发展相联结,使创业活动在取得个人收益的同时产生公共效益。因此,该模式中的自利与公利主要通过市场化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平衡,即青年通过创业获得收益,村民通过就业、分红、租金和产业带动获得发展机会,村庄则通过产业兴旺和资源增值实现整体振兴。

但是,这种模式所面临的问题在于青年创业者普遍面临商业经验匮乏与市场运作知识不足的困境,致使其在面对复杂动态的市场环境时难以作出决策,制约主观能动性的有效发挥。同时,乡村在市场结构、文化背景等方面与城市存在显著差异,使得青年创业者需要较长时间适应乡村环境,限制了其能动性释放,因此政府与乡村需要共同努力打造系统化的青年创客体系,从教育培训、

政策支持、乡村环境改造等多方面着手提升创业成功率。

(三)“高资源嵌入性—高价值主体性”:青年运营的职业化发展

青年运营模式中,青年具有较高的资源嵌入性和价值主体性。资源嵌入性指的是青年个人资源与乡村资源的耦合程度。通过选拔,聘用为乡村CEO的青年通常具备一定的技术、知识、人脉、经验等个人资源,而作为乡村CEO,其核心职责是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乡村资源。因此,为了提高乡村集体的闲置资源利用率,需要充分发挥个人资源的作用,故该模式具有很高的资源嵌入性。乡村CEO作为乡村与外界交流的桥梁,拥有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资源的独特优势,通过构建广泛的合作网络,共同为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注入新动力。乡村CEO依托乡村原有的自然资源与文化底蕴,运用创新思维,深度挖掘乡村的潜在价值,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45]。

青年运营模式中,青年人才具有较高的价值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价值维度涉及需要和满足的关系,人有了需要,须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实现价值目标^[43]。价值主体性指的是人通过实践满足自己需要、创造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程度。价值主体性不仅包括了青年人才的物质需要,还包括了其精神需要。物质需求通过构建合理的薪资体系来保障,精神需要则在追求职业理想的过程中获得。在乡村CEO还未成为正式认定的职业时,入乡青年的价值主体性依赖于区域性、波动性的薪资以及带动乡村发展的个人情怀。当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获得正式的职业认定后,首先选拔招聘和薪资待遇正规化,使入乡青年获得稳定的物质保障。其次,职业认定能够为畅通职称晋升道路、拓宽职业发展空间奠定基础,明确入乡青年发展方向。最后,增加乡村CEO这一身份的影响力,提升社会对该职业的认可度,增强其职业荣誉感。上述变化共同增强了青年运营模式的主体性。

在余杭区的案例中,展示了高资源嵌入性与高价值主体性的青年,如何成长为致力于现代农

村发展的乡村CEO。他们依托乡村自有资源,通过创新手段增强产业附加值,盘活了乡村资源,实现了个人的职业发展与价值实现,更引领着乡村及周边居民共同走向繁荣与富裕。具体而言,该模式主要通过“外生专业运营+内生资源盘活”的方式实现内生与外生结合。乡村CEO将个人所拥有的专业知识、运营经验、市场渠道、品牌策划能力和外部合作网络带入乡村,这些外生专业资源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经营理念和组织方式;与此同时,乡村CEO的工作对象并不是脱离村庄基础重新创造资源,而是对村庄已有的土地、生态、文化、闲置资产、集体经济组织和地方特色产业进行识别、整合、包装和再开发。由此,外部专业化运营能力与乡村内部资源禀赋实现耦合,使原本分散、低效或闲置的乡村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的发展资产。同时,青年运营模式也通过“个人职业价值+集体利益增值”的方式实现自利与公利平衡。乡村CEO作为职业化的乡村运营主体,需要通过薪资待遇、职业认定、职称晋升、社会认可和职业荣誉感满足自身物质与精神需要,这是其价值主体性的直接体现。与此同时,乡村CEO的职业价值还通过提升村集体经营能力、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带动村民参与和促进资源增值来实现。这表明,该模式将个人职业发展与村庄集体收益增长紧密绑定起来:青年运营者越能有效盘活乡村资源、提升经营绩效,越能证明其自身职业能力并获得稳定发展空间;村庄越能为运营者提供职业化保障,越能吸引青年持续投入资源运营和价值创造。因此,青年运营模式中的自利与公利主要通过职业化发展和集体经济增值实现统一。

乡村CEO在村庄中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关键制约因素为是否获得村党组织书记的认可与支持,并能与村“两委”建立起协同合作的良性关系。乡村CEO与村两委的产业发展思路可能存在摩擦,作为代理人的入乡青年必须得到村两委的认同才能推进项目,否则会导致该模式运行效率低下。但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获得正式的职业认定,进一步明确了责任划分,预期未来摩擦会不

断减少。此外,青年运营模式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其高度依赖于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个人能力和关系网络,而以村集体为代表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以本地贤达能人代表的乡村“内生权

威”等内生力量相对薄弱,一旦乡村职业经理人离开或是继任者能力不足,模式的可持续性就会面临挑战。针对这一问题应加强本土乡村 CEO 培养体系,加强外生力量与内生力量的互动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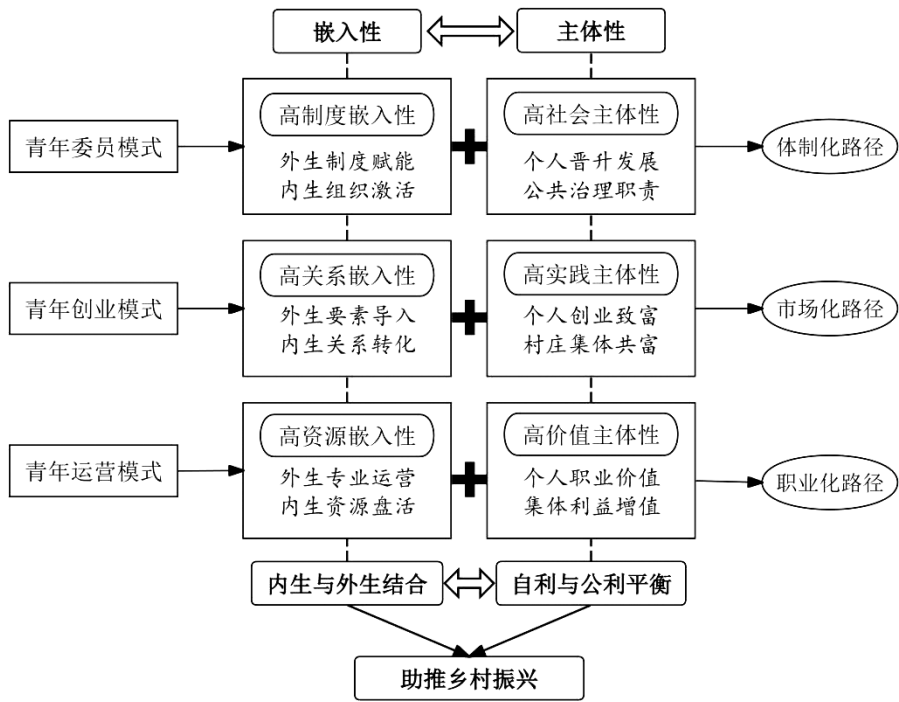


图3 三种青年入乡发展模式的“嵌入性—主体性”分析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的发展潜力正加速释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入乡发展。青年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力军和突击队、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可替代的关键力量,如何找准发展模式,如何更好地参与乡村振兴是回应当前乡村迫切发展需求的重要内容。然而有关青年人才助推乡村振兴的研究大多站在单一视角展开,如从乡村发展角度分析如何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或从青年个人角度分析入乡发展的动力机制,缺乏对青年与乡村互动关系的捕捉,也缺少对青年人才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性机制的讨论。并且,近年来的研究更多关注本地青年返乡、再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或通过剖析个别青年的选择归纳总结某种单一类型的青年入乡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本文从青年和乡村的互动关系出发,构建“嵌入性—主体性”分析框架对青年人才入乡发展的有效性机制进行分

析。选取浙江义乌市、安吉县和余杭区三个区域性发展案例作为分析对象,归纳出三种青年入乡发展类型,对每种模式的实施背景、人才类型、激励机制和发展路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利用“嵌入性—主体性”框架对影响三种模型有效性的关键维度进行了区分,以期制定切实可行的区域性人才引进政策提供参考。

研究表明,入乡青年的嵌入性可解构为制度嵌入性、资源嵌入性与关系嵌入性三个维度,其主体性则涵盖实践主体性、价值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三个层面。嵌入性与主体性分别决定了青年人才助力乡村振兴的能力禀赋与意愿强度,兼具高嵌入性与高主体性特征的入乡青年能够更有效地融入乡村社会并推动乡村发展。具体而言,走体制化发展道路的义乌市青年委员具有“高制度嵌入性”和“高社会主体性”,通过政府选拔进入农村基层组织,发挥治理才能,负责优化乡村治理,寻找共富途径;走市场化发展道路的安吉县创业青

年具有“高关系嵌入性”和“高实践主体性”,自发进入乡村场域利用政府优惠政策,发挥创业才能,挖掘乡村优势资源,与村两委协商合作,实现个人创业理想;走职业化发展道路的余杭区乡村CEO具有“高资源嵌入性”和“高价值主体性”,通过公开选聘成为村集体经济的运营者,受村两委委托,发挥经营才能,负责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实现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带动村民就业致富。基于对浙江省青年人才入乡发展三种典型模式的深度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四点经验启示。

一是以“千万工程”为引领,全面夯实青年入乡发展基础。青年下乡返乡创业需要良好的硬设施和软环境。浙江把长期美丽乡村建设所积淀的乡村人居生态和产业发展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的新动能,从而形成对青年人才强大的吸引力。要借鉴这种创新思维,以“千万工程”为引领,加快乡村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乡村营商环境,加快补齐乡村公共服务短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二是以“引育用留”为抓手,加快补足乡村发展人才短板。要紧紧抓住“人才”这一关键要素,建立健全人才引、育、用、留相协同的制度安排,重点在“出好政策引人才、建好机制育才、搭好平台用人才、做好服务留人才”方面着力,推动人才流带着技术流和资金流进入乡村,为乡村发展补足关键要素短板。尤其吸引一大批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青年人才进入乡村,形成人才的增长极,并对其他人才形成强有力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从而合力形成产业集群、人才集聚和创新集成的乡村全面振兴新动力。

三是以“双向奔赴”为导向,促进乡村与人才的融合发展。不少地方在推动人才下乡返乡中出现“引不进”“难适应”“留不住”等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乡村与人才需求的断接。要推动乡村与人才的“双向奔赴”,除了构筑全方位人才保障体系外,还要抓住年轻人的新品位、新喜好,打造适合他们需求的新场景、新服务。利用乡村闲置或低效利用的资产,集聚种种干事创业的要素,强

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共建共治共享来形成对产业发展的共兴,生活社区的共造和生态环境的共护。

四是以“能级提升”为手段,为引才纳智提供更大的吸引力。受限于乡村能级,教育、医疗、养老、娱乐等公共服务往往难以满足人才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入乡青年也很难在乡村建立自己的“朋友圈”,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网络。因此要借鉴安吉等地做法,出台全域提升乡村能级行动,实施产业质量、人才动力和运营效率“三大革命”,推动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文化风尚、融合治理五大能级跃升,全面增强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让更多的人才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留量。

参考文献:

- [1] 张良驯. 青年概念辨析[J]. 青年学报, 2018(4): 48-55.
- [2] 夏柱智. “中坚青年”和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兼论青年研究视角的优势[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8): 34-41.
- [3] 陶自祥. 乡村振兴与农村青年群体类型的价值研究[J]. 当代青年研究, 2021(3): 66-72.
- [4] 胡那苏图. 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机制研究:基于“本土—返乡”框架的多案例比较分析[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3(1): 40-48.
- [5] 豆小红. 返乡青年互联网创业问题及“政能量”支持:以湖南为例[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5): 91-96.
- [6] 苏海泉, 武书宁, 乔松.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现状分析及社会支持构建:以辽宁省101个县区862名创业者调研为例[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6): 12-16, 23.
- [7] 毛一敬.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基础、类型与功能[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 20(1): 122-130.
- [8] 邱生荣, 范水生, 陈文盛. 返乡青年职业转换与适应研究:以休闲农业经营者为例[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 90-96.
- [9] 何慧丽, 苏志豪. 返乡青年何以返乡:基于主体性视角的考察[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10): 72-78.
- [10] 胡小武. 市场理性与文化乡愁: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青年镜像与群体心态[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9): 5-10, 17.
- [11] 罗敏. 从“离乡”到“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基于H省Z市1231名青年的问卷调查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9): 11-17.
- [12] 张艳斌. 返乡青年的形成机制及主体性建构:基于个体化的视角[J]. 兰州学刊, 2022(8): 125-134.

- [13] 梁栋, 吴存玉. 乡村振兴与青年农民返乡创业的现实基础、内在逻辑及其省思[J]. 现代经济探讨, 2019(5): 125-132.
- [14] 朱云. 返乡青年治村的机制、困境及出路: 基于江苏杨村的案例分析[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2, 21(5): 610-617.
- [15] 郭世平, 毛丽霞. 青年“乡村 CEO”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现实困境和策略选择[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2): 101-108, 118.
- [16] 林龙飞.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内隐逻辑: 基于个人意义构建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10): 62-68.
- [17] 王兴周, 庞嘉楠, 李岩崇. 家庭责任伦理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J]. 青年探索, 2022(6): 85-97.
- [18] 林龙飞, 陈传波. 返乡创业青年的特征分析及政策支持构建: 基于全国 24 省 75 县区 995 名返乡创业者的实地调查[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9): 53-61, 10.
- [19] 王玉玲, 施琪. 县域视野下青年返乡创业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7): 23-28.
- [20] 梁伟, 陈锋. 青年职业农民的乡土嵌入机制与村庄再造: 基于 D 镇返乡创业大学生的案例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5): 111-118, 110.
- [21] 王昆, 崔菁菁. 青年返乡电商创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问题、典型案例和实践路径[J]. 经济纵横, 2023(11): 122-128.
- [22] 董怡琳. “被围困”: 返乡青年的创业困境及其原因[J]. 当代青年研究, 2022(3): 13-19.
- [23] 曹兵妥, 李博, 李仙娥. 嵌入式发展: 青年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困境与路径[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5, 38(1): 105-116.
- [24] 李航, 王杰, 齐顾波. 赋权与嵌入: 制度复杂性下乡村职业经理人自主性生成机制[J]. 中国农村观察, 2024, 24(4): 105-123.
- [25] 何安华, 倪坤晓, 李竣, 等. 培育农村职业经理人市场破解“谁来兴村”发展难题[J]. 农村工作通讯, 2022(2): 33-35.
- [26] 徐进, 李小云. “人才回乡”: 乡村人才问题的历史叙事与现实遭遇[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9(6): 155-164.
- [27] 吴一凡, 徐进, 李小云. 城乡人才要素流动: 对接现代性的浪漫想象: “乡村 CEO”的理论分析与现实困境[J]. 贵州社会科学, 2023(1): 144-151.
- [28] 李航. 冲突、诊断与弥合: 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下的村庄经营: 以“职业经理人入村”为例[J]. 现代经济探讨, 2023(11): 113-123.
- [29] 郭世平, 毛丽霞. 青年“乡村 CEO”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现实困境和策略选择[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2): 101-108, 118.
- [30] 钟楚原, 李华胤. 青年人才何以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嵌入性—公共性”框架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50-60.
- [31] 王玉玮, 黄世威. 媒介化回嵌: 季节性返乡青年的主体性重建: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鄂西北王村的民族志研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118-126.
- [32] POLANYI 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M].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001: 487-490.
- [33] GRANOVETTER M S.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4(19): 481-510.
- [34] ZUKIN S, DIMAGGIO P J.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6.
- [35] 王思斌. 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 社会科学战线, 2011(2): 206-222.
- [36] 李传兵, 喻琳. 嵌入性赋能: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与路径[J]. 中州学刊, 2024(2): 47-54.
- [37] 高奇琦. 国家数字能力: 数字革命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1): 44-61, 205.
- [38] 王维, 向德平. 从“脱嵌”到“再嵌”: 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路径研究: 基于多个青年返乡发展案例[J]. 兰州学刊, 2023(12): 101-112.
- [39] 张煜婕. 青年主体性与职场文化重塑的社会学探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8): 60-68, 111.
- [40] 耿锐. 对“躺平”现象的主体性反思[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3, 44(5): 175-181.
- [41] 郭湛. 主体性哲学: 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50-200.
- [42] 骆郁廷. 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三个维度[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 62(1): 5-10.
- [43] 王维, 向德平. 从“脱嵌”到“再嵌”: 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路径研究: 基于多个青年返乡发展案例[J]. 兰州学刊, 2023(12): 101-112.
- [44] 闵兢, 黄慧. 返乡青年治村的实践逻辑与空间再生产[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8): 50-59.
- [45] 张文明, 章志敏. 资源·参与·认同: 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 社会科学, 2018(11): 75-85.